

如何既是地域的,又是世界的 重新定义长三角文学



第五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在南京举行 江苏省作协供图

2018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学作为一种个体性创造,如何呼应这一时代要求?并借此突破狭隘的地域想象,立足长三角,放眼中国与世界?12月12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在南京举行。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批评家们,对“当代文学总体性下的区域文学发展”这一议题的深入研讨,为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长江文化、长三角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文学发展带来新的思考。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长三角”是空间地理的、政治经济的,也是文化文学的

“长三角”最早是作为政治和经济的概念提出,其能否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文学区域概念,在论坛上引起热议。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认为,长三角地区和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大致重合,前者侧重地理和行政因素,后者侧重文化和历史内涵,我们今天对长三角文学的关注,某些方面不如转换为对江南的关注。

诗歌界曾在江浙沪皖一带的诗人当中选出7位代表人物,命名为“新江南七子”,以显示“江南弟子多才俊”和“卷土重来”。既是对古代“江南七子”的一种历史回应,亦是对江南文化的一种再发现。“这仅仅是一个起点。在整个国家非常重视长三角一体化和文化文学互动的背景之中,对江南诗群、江南文学应该更有效地去深耕挖掘,彼此联动支持,共促发展。”何言宏说。

相比某些逻辑荒谬、生拉硬扯的“省级区域文学”概念,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方维保认同“长三角文学”概念,原因基于长三角“三省一市”地域上的完整性,且历史上四个省市在行政区划上彼此交错,饮食、文化、风俗有诸多相同,人民之间生活往来频繁。

“我们从文学上就可以看到,张爱玲的小说里面,总会会出现一个安徽合肥的保姆。苏童的小说,逃荒的人群总要到芜湖去。距离相近,人民和作家之间长期相互的交往以及文学作品中的渗入,这是能够形成长三角文学的一个基础。”

方维保认同何言宏提出的长三角文学具有一种以江南文化特质为核心的总体性。“江南文化浸染下的江南文学,有着显著的共性,江苏的范小青、苏童,上海的王安忆、孙甘露,安徽的潘军,都能看到鲜明的江南文化的特

点,同时差异性又很明显。”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胡功胜说,安徽正式列入长三角,“现在不管是政府还是学界,都在寻找这个一体化的历史渊源、现实关联和未来的可行性路径。尤其是安徽人,安徽人是更加积极的,安徽人加入长三角是很激动的。”

从文学上来谈一体化的渊源,他认为有两大方面绕不过去,一是桐城派,一是《儒林外史》。“桐城派盛行的时候,一大批桐城派在江南游历。《儒林外史》与江南、与南京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是讲明代的,明代的江南也包括了安徽,当时安徽与长三角还是一体的。”

从文学角度考量今天安徽与长三角关系,胡功胜认为,沿海与内地,或者是城市与乡村这个视角更加合适。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差序格局”,必然造成文学位置上的落差,但这个“落差”不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也意味着发展的潜力和空间。

“体现在当代文学上,有两次弥补:第一次是很多的江浙知青到安徽插队,后来写安徽,比如王安忆;第二次是1990年代打工潮兴起,安徽成为农民工往返的一极、城乡文化的交融之处,这方面安徽作家有着第一现场的优势。我认为安徽作家在长三角文学中是大有作为的。”胡功胜说。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指出,整体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中心与边缘,确实存在着强势与弱势或不平等的关系。客观还是要正视,但是这种不平等并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体现的。而恰恰就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成为文学表达的一种很强烈的诉求。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提出,长三角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文化上的概念,某种意义上是政治和经济的。如果要建构一个“长三角文化共同体”,还是需要先把家底摸一摸。“譬如安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安徽和上海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成立的。”但这种建构不能无限扩展,内在的本质性东西还是需要。

地域性书写如何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

“我们长三角地区,地域文化差距没有那么大,有些地方离得很近,但是长期以来文学创作方面的差距很大,你用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从作家的原初语言与普通话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当代文学的总体性与差异性。

他说,作家必须使用普通话进行写作,每个人都存在把原初语言,即出生地的方言,转换成普通话的问题。当代作家的原初语言天差地别,明白这点就会理解当代区域文化的差异性,也可以领悟某个区域作家的创作特色。以中国古代地方戏曲来类比文学,“地方戏和方言关系非常密切,方言是地方戏的生命,没有方言就没有地方戏。但很多方言没法表达和转化的东西,又必须用官话表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恰恰是地方戏在推广官话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京剧这块影响最大。”

王彬彬认为,不同的原初语言,意味着不同的语言资源。原初语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创作的难易,某种意义上也影响着作品思想的深广度、文学品格。以上海作家群为例,并非每个人都以上海方言为原初语言的。“按照我的理解,王安忆的原初方言不是上海方言,她出生在南京的军区大院。孙甘露的父母是南下干部,山东人,在家里肯定讲山东话。而金宇澄如果不是在上海,一定是写不出《繁花》。”从原初语言的角度研究作家的创作,也迫使我们调整文学意义上的地区意识。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与王彬彬“不谋而合”,也是强调中国

饱满的,但是没有地方性,典故都是希腊的、德国的,我们的长江、黄河、昆仑找不到。——『1923年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两篇文章中批评郭沫若,时代精神是

现当代作家的基本语言策略,就是把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他进一步提出,原初语言跟普通话之间的距离越远,越考验一个作家,越给作家以语言创造的空间。

“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时期,贡献最大的不是北方作家,而是江南作家。他们为了创作,不得不克服方言,而且他们的意愿很强烈。钱钟书就是这样的。《围城》里的人,他们一路到新加坡、越南西贡、中国香港,再从香港到上海下船,从上海回无锡,从上海到金华、宁波,最后结婚又飞回香港,他们把中国走遍了。《围城》几乎覆盖了中国南方所有的方言区,但除了少数例外,钱钟书还是把小说涉及的各地方方言一律转换成通用的书面语。”

在论及文学创作中的“世界、国家与地方”时,郜元宝认为,如果没有世界的想象,就没有“中国”和“地方”概念的刷新。“世界意识”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根深蒂固,这是因为“中国人走出几千年来文化上的幽闭性拥抱世界,在这个方面特别有意识”,很多“五四”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

“我们讨论地方文学不得不讨论的李劫人,他的法国文学的功底太深了。他笔下的四川女人,特别拎得清,这种特质你说是四川的没有问题,但这跟《小妇人》也是相通的,所以往往是,非常地方性的作家,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世界性,更不用说郭沫若、巴金、鲁迅、茅盾。”

郜元宝强调,对作家来说地方性至关重要。文学界之所以用“陕军”“湘军”“江苏作家”“上海作家”去命名,就是因为作家身后总有一个地方,没有地方性的文学很难想象。“1923年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两篇文章中批评郭沫若,时代精神是饱满的,但是没有地方性,典故都是希腊的、德国的,我们的长江、黄河、昆仑找不到。”他也提醒,强调地方性并不意味着对地方性的固守,比如陕西文学的抓地性很厉害,但这也成为抑制文学发展的瓶颈。

郜元宝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一些作家经验值得汲取。以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这部小说为例,小说中的家在苏州,但家里的一些人为了享受现代生活去了南京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们又举家从上海、南京、苏州沿着长江往西逃,一路跑到重庆。这样一来,整个小说突破了单一地域。“如果只写苏州的‘蒋家’,这部小说充其量只是巴金《家》的翻版。”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洪承列举了叶兆言的《南京传》、毕飞宇的《平原》、徐则臣的《北上》,指出这些文本超越了狭隘的地域色彩和想象,对一体化时代的长三角文学具有启示。“《南京传》立足南京,去打开整个中国的历史;《平原》写苏北王家庄,却是对整个70年代中期历史的反思;《北上》的出发点是大运河淮安段,却串起了整个运河沿岸的生活日常,是对旧邦新命的思考。”

一体化时代文学资源要共享也需立足文化产业发展

在新媒体时代,产业发展也对文学造成了很大影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当中,安徽籍文人有巨大的贡献,但是就新文学而言,浙江籍作家是占据现代文学半壁江山的,鲁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穆旦、艾青、夏衍,群星璀璨,但是我们今天说浙籍作家,你会想到谁?流潋紫、南派三叔。”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侃说。

在文化产业的语境下面,文学是高度局促的。“技术改变了文学的写作方式,今天的人们不需要通过吟诵唐诗来抒情表达,因为有流行音乐;今天的人不需要通过小说在叙事的空间当中遨游,他可以看电影、看抖音,文学的功能可以在技术手段里面全部得到替代性的满足。”

当然他并不认为文学会消亡,但公众的阅读和文学创作之间,将越来越不直接发生关系,而是通过文化产业的生产消费来产生关系。文学将作为一种高端的美学形态,为文化产业的产品提供样板。“在这样的文化产业时代,未来的作家可能面临‘杜甫式的命运’。作家的写作不会有现世的回报,而是像杜甫的诗集那样,在身后才被不断地出版。”

不过,浙江大学副教授翟业军却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固化提出批评,“只是对于新文学主题的牙牙学语,对今天高铁和互联网组成一个超级现实,很多文学创作是跟不上的。一些地域性书写,还停留在城市文明对于乡土文明的人侵这类陈旧的题材上面。”

浙江大学教授姚晓雷亦有同感,“科技发展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时空观、人生观,过去的一些价值观已经没有办法覆盖今天的很多问题了。现在的主流作家,尤其是成名作家陷入了一种思想能力的衰退。”相反,从一些网络作家作品中却能够感受到时代的脉动和气息,“在故事的传奇性和生活经验当下性方面,远远超过主流作家。”

汪政提醒,眼下,长三角文学的协同发展,必须立足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如果一位作家不关心技术革命、不关心产业发展,他就不大可能写出真正为消费者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因此,长三角一体化时代的来临,要求作家们更深刻地意识到个体创作与社会总体走向之间的深刻联系,意识到自己可能发挥的无限潜力。”

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在主持论坛开幕式时介绍,“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的前身是“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此论坛与“扬子江作家周”“扬子江诗会”“扬子江网络文学周”共同构成江苏重点打造的“扬子江”系列文学品牌活动。历届论坛的议题都紧跟时代前进和文学发展潮流,为当代中国文学、江苏文学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考与启迪。